

今夜只要护卫中正脱险，我一定洗礼入教……”脱险后，蒋介石认为是祈祷起了作用，自此决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。

## 用《圣经》卜问“国运”

入基督教后，蒋介石虔诚地向“天父”祷告。久而久之，他对基督的信仰，成为支持他渡过重重难关的精神力量，尤其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。

1947年底，东北战况危急时，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至十时祷告三次，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，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、长春各要据点。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，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。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“天父”、“上帝”时，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。

1947年12月29日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十日来各战区告急，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，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。

但此心反无忧惧，夜间安眠胜常。以存亡大事，上帝必有

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？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，为从来所未有之。幸赖上帝的保佑，竟得平安过去了。自今年今日起，必须做一个新的人、新的基督人，来做新民，建立新中国的开始，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，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，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。去年一年经过全年的试验，遭遇无数的凶险，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，实可引为自慰也。”

战场上—败再败，但是信奉基督的蒋介石坚持认为，“天父不会亏待我”。

退守台湾后，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多次说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，称如果“神要赋予我这个使命，那么为了中国的统一大业，不惜自己的生命”。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。退缩在台湾的蒋介石则仍在用《圣经》卜问“中华民国”的存亡问题。

蒋介石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：

“今日国庆双十节，四时起床，盥洗后凝神默祷，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。得使徒行传第9章41节之启示。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。感谢上帝，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，能使之转危为安，重生复兴也。”（编者注：当时，蒋介石祷告后，打开《圣经》，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41节，原文为“彼得伸手扶她起来，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，把多加（天父的女徒）活活的交给他们。”）

10月31日，是蒋介石的生日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本日为我六十三岁初度生日，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。当幼年时，命相家曾称余之命运至六十三岁而止，其意即谓人余六十三岁死亡也。惟现在已过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于世，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，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忱，始终如一有增无已，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

会，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乎？”

杨天石教授告诉《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，此时靠求神问卜来保佑“国家”命运的蒋介石，已经荒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。

## 谜案之三

# “二二八事件”中有没有下过屠杀令

■ 本刊记者 路琰

1947年的“二二八事件”是台湾一段沉重的记忆。“事发时，蒋介石是否下过屠杀令”，一直成为台湾蓝、绿阵营互相攻讦的政治议题。每到台湾选举日或“二二八”纪念日，这场血案就会被民进党拿出来当悲情牌，打击国民党。

“二二八事件”始于一次缉私行动。1947年2月27日中午，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接到密报：有人走私卷烟。当查缉员赶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时（今延平北路附近），走私贩早已逃散，只有一名40岁的寡妇林江迈在叫卖香烟，其中有走私烟。查缉员没收了她的全部香烟和现金。林江迈跪在地上，抱着查缉员的腿哀求道：“我还要抚养一子一女，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，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造的香烟还给我吧……”围观的人纷纷为林江迈求情。查缉员唯恐情势失控，用枪托击打林江迈的头部，迫使她松手。

鲜血从林江迈的头上流下。这一幕深深刺激了围观民众，他们愤而包围查缉员。一名查缉员开枪示警，子弹误中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（当时

■ 蒋介石日记（下）和蒋介石阅读、圈点过的《圣经》（右上）。

意者，绝非人力所能强制，故自问无愧。”

即使战况持续恶化，蒋介石对“天父”并无怨尤，而以多祷告表达虔敬之心。

在1949年1月1日的日记中，蒋介石写道：“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子，

年仅20岁，次日死亡)。随后，查缉员逃往警察局。当晚，激愤的群众包围了警察局，要求惩凶。2月28日，台北市民通告罢市，示威请愿，并占领了广播电台。随后，风暴席卷整个台湾，示威群众遭到军警镇压，造成数千人伤亡。这段流血的历史，被称为“二二八事件”。

### 台湾不测之变，“苦心焦虑不知所极”

就在“二二八事件”发生的第二天(1947年3月1日)，蒋介石写了一篇日记《上星期反省录》：“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，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同胞，其暴动地区已渐扩大，以军队调离台湾，是亦一重要原因也”。

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对“二二八事件”的第一次记录，表明他对事件的起因做出了初步判断：“暴动”的导火索是台湾群众反对纸烟专卖政策，但“暴动扩大”的根源，是1945年台湾光复后，南京国民政府把驻台的第62师、第70师调离台湾，投入到内战的战场上，使得台湾驻军不足，无法及时控制“暴动”局势。

当时，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，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，也是国民党里的“台湾通”。蒋介石对陈仪一直信任有加，甚至同意他在台湾实行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。但“二二八事件”发生后，陈仪先是隐瞒不报；局势失控时，又张皇失措，于3月6日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军队分三路向市区进击；最后事态日益严重，才急电南京国民政府，要求调派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和宪兵一营来台平乱。

蒋介石震惊之下，对陈仪大失所望。从3月第二个星期开始，出兵延安的计划以及台湾“二二八事件”，成为蒋介石日记中最关心的两件事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台湾暴力形势已扩张至全台各城市，严重已极。公侠（编者注：陈仪，字公侠）未能及时报告，粉饰太平，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，可痛。华

北延安共匪祸正炽，而又加此不测之变，苦心焦虑不知所极。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。”

### “惟无精兵可派”，“现时惟有怀柔”

1947年3月7日，蒋介石考虑派兵台湾之事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台湾暴动自上月28日起，由台北延至全台各县市，对中央及外省人员与商民一律毆击，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众……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。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，或易为力。”

但是，蒋介石已将大部分兵力投入内战中，他面临无兵可调的局面。反复思量后，蒋介石又写道：“惟无精兵可派，甚为顾虑。善后方策尚未决定，现时惟有怀柔以稳。台民初附，久受日寇奴化、遗忘祖国，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。”

杨天石教授对《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分析道：“怀柔”一词，源于《诗经》，是用笼络和感化的方法，解决对抗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，避免大规模流血。‘现时惟有怀柔’，意味着蒋介石决定采用

温和的方式。这篇日记奠定了蒋介石处理‘二二八事件’的基本策略。”

蒋介石为何选择“怀柔”？通过对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历史资料的研究，杨天石教授认为有两大原因：其一是1947年的时局。当时抗战结束不到两年，中国百废待兴。沦陷区接收、政府组织重建、各党派政治协商等等，千头万绪，交逼而至。特别是国共内战，成为蒋介石的第一要务。“二二八事件”在蒋介石的全盘工作中，只是一个突发的热点。

其二是台湾的特殊情况。1945年10月25日，台湾结束了自中日甲午战争后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，归还给中华民国。在陈仪的集权统治下，台湾社会形成了复杂的关系——与大陆隔绝50年的台湾居民，对国民党当局深感失望；从大陆迁入台湾的近2万名国民党公务人员，与台湾民众有所隔阂；留在台湾的8000多名日籍人员，时时和台湾民众发生冲突；在日据时期成长起来的“台湾精英”，仇恨国民党公务人员霸占公职，使得他们升迁无门。“二二八事件”的发生，使台湾人和外省人的隔阂、台湾人和日本人的仇恨、“台湾精英”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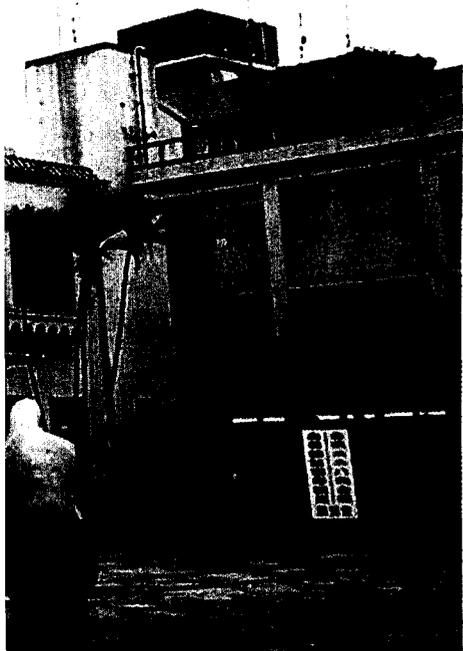
国民党统治者的争夺，都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。“暴动”演变成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。蒋介石不得不慎重处理。

## “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”

1947年3月8日，迫于局势，蒋介石开始调兵台湾和部署党务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朝课后考虑台湾问题与延安方略，召见刘雨卿（编者注：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）指示对台湾注意各点。正午约李翼中（编者注：台湾省国民党党部主委）等谈对台湾处理具体方案。”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：“朝课后写公使信，召见刘雨卿等指示到台湾后之方针与部署毕。晚与健生（编者注：国防部长白崇禧，字健生）谈台湾与华北情形。”

当天，刘雨卿向蒋介石辞行，率21师师部及146团开赴基隆。蒋介石对刘雨卿下达的指令是：“宽大处理，整饬军纪，收揽人心。”同时，他指示陈仪道：“政治上可以退让，尽可能地采纳民意。军事上则权属中央，一切要求均不得接受。”

台湾台北“二二八”纪念馆



但2万大军抵达台湾后，仍然和“暴动”民众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。蒋介石得知后，在3月12日的日记里再度批评陈仪“不自知其短缺，使余处理为难”。第二天，他亲笔手书，严厉指责陈仪：“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，否则以抗令论罪。”当晚，蒋介石找来国防部长白崇禧，面谈台湾情形，决定由蒋经国陪同白崇禧，前往台湾视察、慰问。3月19日，当白崇禧在台湾视察时，蒋介石又追加了一封急电给白崇禧，要他转命刘雨卿：“应特别注重军纪，万不可拾取民间一草一木……勿使官兵借口败坏纪律。”直到台湾局势平静，蒋介石才松了口气，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派兵决定的满意：“台湾事变自军队运到后已大半平（编者注：音同“米”，意为“抚平、安定”）平，然亦未曾根本解决也。可知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。”

杨天石教授分析说：“‘二二八’悲剧的造成，蒋介石无疑要负责任，他迷信军队的作用。但考察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日记、与军方的来往函电，都没有发现他下达过屠杀、诛戮的命令。国民党军队显然做不到令行禁止，滥捕、错杀屡有发生。正是这一点，被民进党当作了政治攻讦的工具。以‘二二八事件’的死亡人数为例，民进党说有20万人。我查阅了台湾行政院所辖的‘财团法人二二八基金会’的补偿记录，上面写道‘计本省人死亡673人，失踪174人，其它羁押、徒刑、伤残、健康名誉、财务损失共1237人，合计为2084人’。这才是比较可靠的数字。”

直到1947年四五月间，蒋介石日记中的“反省录”与“工作课目”，还陆续出现有关台湾善后处理措施的记录，包括“研究台湾派员处理善后之时机”、“台湾省政府组织之发表”、“台湾省政府与行政长官公署存废时期之决定”、“台湾省政府主席与组织之决定”等等。可见，对于“二二八事件”后台湾如何尽快恢复秩序，蒋介石颇为重视。

## 谜案之四

# 为何大骂美英首脑

本刊记者 许陈静 路 琰

蒋介石亲美、亲英，是不争的事实。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还是在国共内战中，蒋介石都得到了来自美英，尤其是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。

但在蒋介石日记中，屡屡有他暴跳如雷，怒骂罗斯福、丘吉尔、马歇尔等人的文字。他为何会大骂美英首脑？他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？

## 险被罗斯福刺杀

1945年3月15日、4月13日和4月30日，蒋介石先后在日记里大骂美国总统罗斯福“卖华”、“侮华”，“畏强欺弱，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，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”。

蒋介石和罗斯福的积怨，最早始于“史迪威危机”。史迪威是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，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，并指挥盟军在印度、缅甸战场的作战。由于史迪威一派“太上总督”的大国主义作风，蒋介石很快与他失和。1942年5月10日，史迪威不征求蒋介石意见，独自指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、印度作战，蒋介石在日记里骂道：“史迪威对我在缅甸军队亦掉头不顾，对余无一请示，亦无一报告，独自径避印度，此实出于人情之外。”1943年6月28日，史迪威又拒绝将罗斯福的海军兵力表交给蒋介石，蒋介石在日记里痛骂：“此人无常识、无人格，实